

能源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分析*

◎ 赵秀凤 中国石油大学 中国国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

摘 要 本文结合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案例,运用田海龙(2017)提出的社会实践网络分析模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系统分析了西方学者、媒体、政治行为体协同建构的“中国能源威胁论”。研究发现,学者、媒介、政府三位一体,相互渗透,借助各类话语突显和话语架构策略,把中国能源问题“安全化”,致使普通的商业并购行为也被贴上“危险”标签。通过政客游说、政府审查和立法等行政手段,从上到下纵向再情景化,造成了中海油竞标失败的后果。本文强调指出,学术精英在专业类话语如能源话语实践网络中发挥主导和操纵作用,专业学术话语应该引起批评话语分析者的高度关注。

关键词 能源话语; 社会实践网络; 批评话语分析

1. 引言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与能源相关的诸多问题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油价波动等,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中心议题,而且也是关乎人民生活质量和人类福祉的民生问题。因此,能源问题成为政治行为体和媒体共同关注的焦点。国际和国内社会围绕能源问题所进行的各种社会实践,形成了大量的能源话语。该类话语集知识性和权力性于一体,借助专业知识的权威性及权力的生产性和制约性力量,大量传播,在引导和形塑公众认知和舆论的同时,建构社会现实,影响政府决策。

* 通讯作者: 赵秀凤

联系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102249)府学路18号,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电子邮件: xiufeng96@126.com

在全球视野下,把能源话语置于国际政治博弈或社会变革的时代语境,对围绕同一能源主题的话语实践展开批评话语研究,揭示话语背后的社会—政治意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视能源话语研究,尤其是在传播学、政治学、外交学等领域,能源研究的话语视角成为一种主流研究范式(如 Boykoff, 2007; Nerlich et al., 2010; Rogers-Hayden et al., 2011; Erkama & Tukiainen, 2014 等)。他们把“话语”视为研究能源实践的一种有效路径,考察话语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叙事方式对特定能源政策或实践进行建构、形塑和传播。在我国,关于能源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主要体现为对国际能源话语权和建立中国能源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于宏源, 2017; 翟石磊, 2014)。直到近几年才有少量学者从事媒介批评话语分析时,涉及能源相关议题,如气候变化(袁榕璟, 2016; 李璠, 2017)、低碳经济(钱毓芳, 2016)、中国能源政策(苏醒, 2017)、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开发(朱哲等, 2016)等。这些研究也主要是采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关注语言文本内的微观语言表达对特定议题的建构作用,对具体话语实践之语境因素的考察不够深入和全面,缺乏对围绕同一能源主题的不同话语实践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

事实上,正如乔尔·科特金(2006)所言,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像能源那样影响如此多的人和企业,也没有什么比能源更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能源的触角渗入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生等众多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于能源问题的话语实践之间势必相互勾连和影响,构成纵横交叉的立体网络。如果我们把话语视为相互联系的社会实践网络,那么,就有必要全面考察能源话语的社会实践过程,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运用的词汇、语法、语篇结构等文本形式表层,而应该以“话语”为研究对象,对话语活动所涉及的主体、身份、机构特征、交际语境等社会活动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田海龙, 2016),揭示话语背后的立场和利益。

本文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结合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案例,把围绕“中国能源威胁论”所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实践网络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田海龙(2017)提出的基于社会实践网络的批评话语研究模式,分析西方学者、媒体和能源机构如何通过话语实践网络平台,建构“中国能源威胁论”,排斥和遏制中国能源发展,以此揭示话语实践网络与意识形态、国家立场之间的动态关系。

2. 话语与话语实践网络

2.1 话语与话语体系

“话语”是一个在多学科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学科不同，其内涵或侧重点不同。例如语言学领域，“话语”（discourse）与“语篇”（text）往往交换使用，指用于交际的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Harris, 1952; Schiffrin et al., 2001），语言学中的话语虽然也考虑话语使用的情境因素，但是没有强调话语的社会性或话语使用的社会—政治意图。政治学领域，哈维（Harvey, 1996）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与其他元素如社会关系、权力、物质实践等一起建构社会现实，发挥塑造社会职能。在国际关系领域，话语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持、巩固或改变国家地位及权势关系的重要手段，享有国际话语权的国家，通过话语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国际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为本国在相关领域发挥优势地位及主动权服务（梁凯音，2009）。在传播学领域，话语是“语言或表达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而产生并传播某个重要话题的一系列连贯意义。这些意义服务于话语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从意识形态上试图使这些意义自然化成常识”（Fiske, 2010: 14，参见王晋军，2015: 30）。

语言哲学和批评话语研究则倾向于把话语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把话语界定为一种社会实践。如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92）强调指出，话语不仅限于语言表征形式，而且还包括与语言使用相关的所有社会因素，如使用者的身份、价值取向、阶级立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这些社会因素决定和影响着语言的表述方式和运用规约（田海龙，2009）。话语是给人类行为赋予意义的符号实践活动，是创造理解和解释现实的意义范畴。话语让被赋予意义的人类行为变成可以理解的现实。所以话语不是关于客观现实的知识，而是创造现实可以被理解、归类从而具有意义的条件。同样，在福柯看来，如果追溯历史，没有什么是既定的和必然的，现实是话语实践活动争夺的结果（Foucault, 2013）。沃达克（Wodak, 2001）对话语进行了概括性界定，话语是围绕某一宏观主题展开的论述。这一界定突显了话语彼此之间的交互性和关联性，也强调了对同一主题相关话语展开系统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围绕某一个领域如能源领域，关涉同一个议题如“能源与环境”的话语，势必在话语的语言表征形式如词汇（尤其是术语）、句型、话语结构等存在交叉或重叠，而且，势必在话语的观点、内容、话语基调等方面互文（intertextuality）或互语（interdiscursivity）。围绕同一个主题展开论述的话语之间彼此联系照应，就会形成这一领域的话语体系（田

海龙, 2016)。当然, 同一话语体系内的具体话语之间也存在竞争或压制关系, 因为话语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交流对象、话语使用场合以及所依托的组织和机构等存在差异甚至对立, 具体话语所构建的身份、再现的事实、参与的社会活动也会因此而迥异。因此, 有必要把同一领域内的话语系统看作一个开放的、动态交互系统, 多种话语要素相互关联、竞争、压制、排斥, 推动社会实践的存续、前进或变革。如在能源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 由于围绕相同或相近主题, 具体的话语实践更容易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体系。该能源话语体系运用特定的话语和修辞策略, 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 建构全球能源格局, 左右利益相关方尤其是决策者的能源政策和能源行为。

2.2 社会实践网络分析模型

田海龙(2017)立足于社会实际, 基于整体主义哲学和联结主义思想, 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网络模型, 提倡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考察一个话语实践与另外一个或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运用这种社会实践网络分析模型, 有助于全面、立体地考察具体话语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更符合话语体系的运作实际, 提高对话语实践本质和功能的认识。

田海龙(2017: 8)指出, 在社会生活中, 社会实践并非单一、独立存在, 一个领域里的不同社会实践以及不同领域里的各种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 彼此相互影响, 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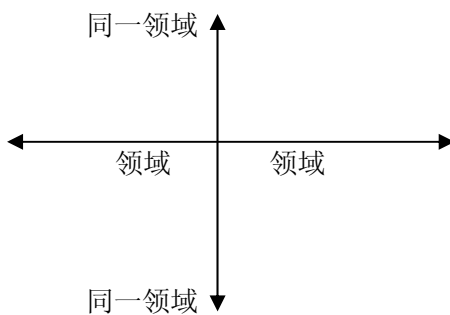


图1 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

社会实践网络纵横交错。横向维度上, 不同领域如行政管理领域与新闻宣传领域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 形成一个杂糅的、实现多种目的的社会实践。纵向维度上, 同一领域不同级别的机构之间,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相互印证、支持, 形成一种同声交互效应, 表现为上位社会实践对下位社会实践的支配和规范(田海龙, 2017: 8)。

这一模型不局限于单一社会实践或同一社会领域孤立地进行研究, 而是从立体的维

度审视“话语生产、传播、消费之间”(Fairclough, 1992)的相互作用,以此来研究“社会实践的网络以及网络中的社会实践构成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 37; 田海龙, 2017: 9)。

该模型更全面,更符合话语实践的本质。下面我们以“中国能源威胁论”话语为例,阐述这种话语实践立体动态互动效应。

3. “中国能源威胁论”话语实践网络分析

3.1 学术精英的“威胁”架构

20 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石油进口量和石油消费量骤增,从 1993 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输入国。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再加上庞大的人口数量和能源消费基数,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原油的依存度从 2005 年的 39.5% 上升到了 2015 年的 60.69%; 能源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对此,西方政客、学者、媒介频繁发声,相互应和,大肆渲染“中国能源威胁论”,谴责中国“吞噬世界有限资源”“破坏环境”,指责中国抢夺能源市场、能效低,威胁全球环境质量,称中国在非洲等地区的能源投资是一种“新殖民主义”。

在炮制“中国能源威胁论”的队伍中,国际能源政治、国际关系学等领域内的能源问题专家冲锋陷阵,扮演了先头兵的角色。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西方学界就连续发表“中国能源威胁”的相关言论,认为:(1) 中国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将对国际能源市场带来冲击;(2) 中国开发自身资源的潜力影响东亚地区安全;(3) 中国能源外交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4) 中国维护能源运输安全的战略需求将导致亚洲能源消费国家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挑战美国海上霸权地位;(5) 中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对地区和全球的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Salameh, 1995; Calder, 1996a, 1996b, 1997; Yergin, 1998; Fesharaki, 1999; Manning, 2000; Andrew-Speed, 2002; 参见伍福佐, 2006)。这些学者站在西方立场,以维护既定美国霸权、遏制挑战为己任,达成共识:“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所造成的对海外石油高度依赖的情势,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将对国际能源市场、国际安全甚至环境等方面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伍福佐, 2006: 53)

在具体的话语策略上,这些学术精英在反复强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同时,用竞争性或战争性语言直指中国的能源战略。如萨勒门(Salameh, 1996)、卡尔德(Calder, 1996a, 1996b, 1997)、费沙拉基(Fesharaki, 1999)、凯恩(Kane, 2001)、安德鲁·斯彼德(Andrew-Speed, 2002)等纷纷著书立说,以如下字眼为题突显和建构“中

国能源威胁论”：

[1]“中国石油和地区冲突风险”(China Oil and the Risks of Regional Conflict)

[2]“亚洲的空油气罐”(Asia's empty gas tank)

[3]“亚洲的死三角：军队、能源和增长威胁亚太平衡”(Asia's Deadly Triangle: How Arms, Energy and Growth Threaten to Destabilise Asia-Pacific)

[4]“助燃升起的太阳：亚洲的能源需求和全球安全”(Fueling the Rising Sun: Asia's Energy Needs and Global Security)

[5]“中国的饥渴：食物和能源需求上涨的后果”(China's hunger: the consequences of arising demand for food and energy)

[6]“中国能源需求的战略意义”(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中国”“能源”“风险”“冲突”“威胁”“(能源)饥渴”等关键词大面积、高频率使用，使得“中国能源威胁”这一话题高度突显。由主体间建构的这种威胁，通过话语的传播，逐渐被赋予了“存在性”特质。通过这种“诊断性架构”策略(diagnostic framing, Snow & Benford, 1988; 参见艾喜荣, 2016: Cha.2: 11)——对问题进行清晰地界定并指出导致问题的责任者，把中国架构(framing)为敌人，把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的能源消费量的增长架构为对既定国际能源秩序的挑战，使中国成为“事实性”责任方。

架构效应是精英影响公民或政治行为体意见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引导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特定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影响人们对于问题的看法和偏好(Drunkman & Nelson, 2003)。西方能源专家对中国经济和能源发展的敌对架构，在西方政界和民众中不但引发对立和恐慌情绪，更重要的是，这种敌对构想，符合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很容易成为媒体的热点。如自20世纪末起，中国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碳排放等就成为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把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定义为“能源扩张”“抢占市场”“抢夺资源”(吴磊, 2009)。

这样,从90年代末,“中国能源威胁论”从少数学者的理论分析或构想,到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话语实践实现了从学术领域到新闻传播领域的横向跨界,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话语突显和话语架构策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能源问题被西方政治行为体“安全化”,“中国能源威胁”成为政治行为体和民众的共同思维定式,被纳入了美国国家安会议事日程,致使与中国能源相关的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即使是正常的商务活动,也会被贴上“危险”的标签。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的案例,就完美地展现了不同话语主体在横向和纵向维度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个过程。

3.2 “威胁论”视域下的商业活动政治化

在“中国能源威胁论”悄然兴起之际,2005年6月22日,中海油以高出竞争对手雪弗龙石油公司约20亿美元的竞标价,提出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 Corporation),这在美国各界引发了一系列强烈反应。

这一消息首先触发了美国政客的恐惧神经,感觉“威胁”从之前的论调转换为当下的社会现实。优尼科正式接收中海油报价的第一天,便有41名国会议员以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为由,向布什递交了公开信,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彻底审查。之后又有几十名国会议员参与游说。继而,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商务部分头行动,以投票决定或通过严格审查或修正案的方式,阻挠中海油收购。7月13日,众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还对中国的崛起可能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举行了听证会,启动制度化程序,正式把普通的商业并购行为政治化,上升为国家安全。为此,7月30日,国会启动立法程序,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Energy Policy Act Amendment),要求政府120天内对中国的能源状况进行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批准中海油的收购,这基本上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对优尼科的收购要约(朱晓寒,2015)。

同时,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对整个并购过程进行了高频率、全方位的报道。如《华盛顿邮报》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高达47篇。6月24日,即优尼科正式接收中海油报价的第一天,《华盛顿邮报》同时刊登3篇文章长篇报道和评论中海油竞购事件。其中一篇把矛头直指中国能源需求巨大,提升油价,引发经济学家担忧(“Oil's Fire Gets Hotter; As Demand Drives Up Prices, Economists Worry About Effects”)。该文直接把油价上升归罪于中国能源需求,用“巨大胃口”(China's huge appetite for oil)提及中海油竞购,很显然,这是上述“中国能源威胁论”学术和媒体话语的再情景化和具体化的产物。

另外两篇分别聚焦与中海油一起竞购的雪弗龙石油公司和国会的态度。在标题中含有“雪弗龙”的报道中,通篇用“战争”隐喻架构(framing),火药味十足,如“战斗将非常残酷、漫长”(the fight could become bitter and protracted)、“击败中海油”

(defeat CNOOC)、“竞购战”(a bidding war)。而且, 该文还直接亮明优尼科主管对此竞购的态度:

[7] While the directors have a legal duty to protect shareholder interests, they could still reject a higher bid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that it is not in the best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or is not likely to win regulatory approval in Washington.

尽管他们[优尼科主管]有法定义务保护股东的经济利益, 但是, 他们仍然可能拒绝出价比雪弗龙高得多的中海油, 原因包括: 不符合公司的长期利益, 不太可能得到华盛顿法规的支持。

(*The Washington Post*, 2005-06-24)

该文还对政客们的激烈反应进行了详细报道(rising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Washington to CNOOC's bid): 要求政府依据外国公司投资法严格审查中海油。有趣的是, 文中最后还引用专业分析人士阿姆斯特朗(Jeb Armstrong)的建议, “让政府干预并购”(let the government run interference for them), 通过大众媒介, 为阻挠竞购, 直接出谋划策。

第三篇题为《中国石油竞购惹怒国会: 企图接管美国公司, 引发“报复”声不断》(“China's Oil Bid Riles Congress; Attempt to Take Over U.S. Firm Spurs Calls for Retaliation”)。该文为长篇评论, 全文 1460 字, 开篇即把中海油竞购事件置于“中国威胁”框架下描述国会议员的反华情绪: political fears of China's economic might, anti-China sentiment, leaving Bush with an uphill battle。该文通篇充斥着对中国的谴责和恐惧, 如:

[8] That, in turn, has stoked **anx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small manufacturers feel **threatened** by China's low labor costs and willingness to bend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ow they **fear** a broader Chinese takeover.

这戳痛了美国的**焦虑**神经。很多小企业主认为中国劳动力低廉, 变通国际贸易规则, 因此感觉受到**威胁**。他们为更大规模的中国竞购感到**担忧**。

(*The Washington Post*, 2005-06-24)

该文还包括美国各类人群提出的针对中国的应对措施,频繁使用“警告”“反对”“报复”“立法”“惩罚”等词表明反对之强烈,给美国政府施压。

以上仅以《华盛顿邮报》为例,事实上,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在竞购商业活动刚刚启动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亮出政客、分析人士、竞争公司等敌对态度和举措,突显中海油的国企身份,引导舆论导向,点燃民族情绪,迫使政府采取措施,干预商业活动。

除了政客游说、媒体造势,美国各级部门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美国众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频道(NBC News)联合进行民意调查,国会通过能源法案新增条款等。这些活动又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多渠道立体传播,不断演绎、推销和扩大“中国威胁论”。

这些社会实践活动涉及政治、立法、经济、新闻、智库等不同社会领域,相互作用,彼此呼应,营造了一种“同仇敌忾”的反华氛围,迫使当时的布什政府行政干预,也迫使优尼科公司违背经济原则,做出低价选择。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面对压倒一切的“对抗”声,也有人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财政部部长斯诺(John W. Snow)反对采取立法手段阻挠竞购,认为这会引发贸易战。斯诺明确表示:

[9] Resorting to isolationist trade policies would be ineffective, disruptive to markets and damaging to America's special role as the world's leading advocate for open markets.

诉诸孤立主义贸易政策,将无济于事,破坏市场经济,损坏美国作为开放市场经济领导者的国际形象。

(*The Washington Post*, 2005-06-24)

这说明,在横向社会实践网络中,跨领域横向联结的话语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杂糅性。但是,一个问题一旦被安全化,主导声音就容易对其他不同声音进行压制,营造氛围,诱发“预期性架构”(diagnostic framing)——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具体的策略、手段和目标(Snow & Benford, 1988; 参见艾喜荣, 2016: Cha.2: 11),以确保应对政策或法规的合法化。

从纵向维度上看,在该事件发生之前,由学者和媒体联手炮制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以权威姿态,在美国营造了反华的宏观社会文化语境。该竞购消息发布后,加剧了美国各界的恐慌。于是,通过议员联名信、听证会、财政拨款修正案、能源法案新增条款等一系列上级政治和立法活动,要求下级部门——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协调一致调查中国的经济成长、军备扩充、能源需求以及在世界各地争取油源的行动,判断中国围绕能源安全的活动是否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商业活动作为最底层的社会实践,必须接受上级行政、立法等机构的制约。竞争对手雪弗龙公司深谙此道,借机对中海油的国企身份大做文章,步步紧逼。上级立法机构实施的立法社会实践,下级政府机构会按照法律要求实施审查,商业活动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由此,通过上位社会实践对下位社会实践的支配和规范(田海龙,2017:8),在纵向维度上行使权力关系,实现社会实践之间的纵向互动。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围绕中海油竞购的纵向社会实践,通过“审查”“立法”话语从上到下纵向再情景化,造成了中海油竞标失败的后果。

中海油竞购美国石油公司的整个过程,再次印证了话语对社会现实建构的强大威力。一个普通的商业并购行为被纳入国际关系框架,经济活动的政治化、安全化,直接影响到经济事件本身。美国国会、利益集团代言人通过话语建构和言语行为将这一商业行为安全化,并通过大众传媒获得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支持,认为政府占股70%的中海油若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成功,会使中国政府获得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技术和资源,最终出价最高的中海油退出竞标,导致中国对于美国能源领域的投资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持续低迷,极大影响到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

能源问题安全化是西方惯用的话语策略,通过专家、学者或政客相互支撑的话语实践活动,诱导人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去看待能源,思考能源问题,诱发能源问题的军事解决方案。西方能源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能源威胁论”,通过立体的能源话语实践,把能源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在反复实践中迎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与零和博弈的战略定位。能源问题安全化,易于把国家塑造成为能源安全的主体和客体,通过国家行为解决能源问题就会顺理成章。普通议题安全化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会导致国家主体采取应急手段,打破常规政治进程,采取非理性手段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又往往会诱发一系列话语,证明行动的合法性,进行合法化话语建构。

4. 结语

本文沿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话语观”,结合实例,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对“中国能源威胁论”话语实践网络进行了系统分析。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

统的世界能源格局,威胁到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享有的全球能源霸权,引起了欧美学者、组织机构和媒体的强烈不适、不满,他们通过纵向持续轮番发酵和横向跨域呼应,制造一系列话语和社会实践,多渠道地生产、消费和传播“中国能源威胁论”,迎合西方社会民众的恐慌心理,传播和塑造思维定式,冲刷和巩固社会认识图式,达到排斥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交际目的,同时,也为特定能源政策的合法化提供话语和实践支持。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系列“中国能源威胁论”实践网络中,国际能源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学术精英,沿用西方霸权思维定式,对中国的能源经济活动进行政治化建构,以学术权威身份,塑造和传播对抗和博弈思维。拥有知识权力的精英阶层主导、统治和操纵话语实践网络,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也易于巩固话语体系的权力关系。对此,批评话语分析者应揭露话语、权力和操控之间的关系,挑战不平等、不公正等现象,推动社会的进步。学术精英在专业类话语如能源话语实践网络中发挥主导和操纵作用的现象提示我们,批评话语分析除关注媒介话语外,还应该重视专业学术话语,揭示学者的国家立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对话语的操纵。

参考文献:

- Andrews-Speed, P. 2002.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ykoff, M. 2007. From convergence to contention: United States mas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scien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2): 477-489.
- Calder, K. E. 1996a. Asia's Empty Gas Tank. *Foreign Affairs*, 75 (2): 55-59-61.
- Calder, K. E. 1996b. Asia's Deadly Triangle: How Arms, Energy and Growth Threaten to Destabilise Asia-Pacific. London: Nicholas Brealy Publishing.
- Calder, K. E. 1997. Fueling the Rising Sun: Asia's Energy Needs and Global Secur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ummer: 24-27.
- Druckman, J. N. & Nelson, K. R. 2003. Framing and Deliberation: How Citizens' Conversation Limit Elite Influ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 (4): 729-745.
- Erkama, N. & Tukiainen, S. 2014. Energy Discourses in Europe—Legitimation of EU 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In Helfert, M. et al. (eds.). 2014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mart Grids and Green IT Systems (*Smartgreens* 2014). Barcelona, Spain, 3-4 April, 2014.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 Fesharaki, P. F. 1999. Energy and the Asian Security Nexu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3 (1): 83-99.

Fiske, J. 2010. *Television Culture*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2013.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Hajer, M. A. 1995.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Z. 1952.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28): 1-30.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London: Blackwell.

Manning, R. A. 2000. *The Asian Energy Factor: Myths and Dilemmas of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Pacific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O' Neil, S. et al. 2012. On the use of imagery for climate change engagemen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3): 413-421.

Rogers-Hayden T., et al. 2011.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Constructing UK energy discursive realit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 134-142.

Salameh, M. G. 1995. China Oil and the Risks of Regional Conflict. *Survival*, 37 (4): 133-146.

Schiffrin, D. et al. (eds.). 2001.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Snow, D. A. & Benford, R. 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 197-217.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1-13.

Yergin, D. 1998. Fueling Asia's Recovery. *Foreign Affairs*, 77 (2): 34-50.

艾喜荣, 2016, 话语操控与安全化——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对比研究, 外交学院博士论文。

科特金, 王旭等译, 2006, 《全球城市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璠, 2017, 基于语料库的中美气候变化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新闻研究导刊》, 第 12 期, 59-61 页。

李昕蕾, 2013,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学习机制与话语建构: 中国能源安全观念的绿化及其对能源和气候外交的影响, 苏长和编,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十二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凯音, 2009, 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第 3 期, 110-113 页。

- 宁丽飞, 2005, 中海油竞购遭遇“中国能源威胁论”, 《市场论坛》, 第7期, 69-71页。
- 牛琦彬, 2007, 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事件分析,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期, 12-15页。
- 钱毓芳, 2016, 英国主流报刊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2期, 25-35页。
- 苏醒, 2017, 对《纽约时报》关于中国能源政策相关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外交学院硕士论文。
-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田海龙, 2016, 跨文化研究的话语解读——再情景化模式,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50-60页。
- 田海龙, 2017, 社会实践网络与再情景化的纵横维度——批评话语分析的新课题及解决方案, 《外语教学》, 第6期, 7-11页。
- 王晋军, 2015, 国外环境话语研究回顾,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期, 29-34页。
- 伍福佐, 2006, 威胁还是整合?——试析西方学界对中国能源安全影响的争论, 《国际论坛》, 第5期, 52-56页。
- 吴磊, 2009, 《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于宏源, 2017, 话语权、能源博弈和国际体系变迁, 《学术前沿》, 第2期(下), 32-37页。
- 袁榕璟, 2016, 中美气候变化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云南大学硕士论文。
- 翟石磊, 2014, 国际涉华能源话语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对外传播》, 第1期, 45-47页。
- 朱晓寒, 2015,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海外能源投资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对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的简要评述, 《法制博览》, 第4期, 49-50页。
- 朱哲、王桂云、黄敏, 2016, 对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开发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以英媒为例, 《现代语文》, 第10期, 135-140页。

**An Analysis of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of Energy Discourses:
Case of “China Energy Threat” Discourses**

Zhao Xiufe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 Taking CNOOC’s failure bid for Unocal as a cas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odel of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proposed by Professor Hailong Tian to the practice network of “China energy threat” discourses constructed by the West. This study, conducted along two dimension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veals that elite, media and political agent constitute a trinity, which jointly securitized China energy issue by means of diverse discourse strategies such as topic salience and framing. Under the lens of securitization, an average business transaction was labeled “risky”. Consequently, a series of hierarchical political actions from lobby, sanction to legislation finally caused the failure of the bid.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academic elites play a leading and manipulative role in practice network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 such as energy discourse, and professional scholarly discourse calls for the atten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ts.

Key words: energy discourse, social practice networ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作者简介:

赵秀凤，女，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研究方向：话语研究、多模态分析。